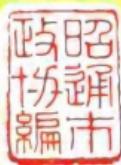


昭通文史資料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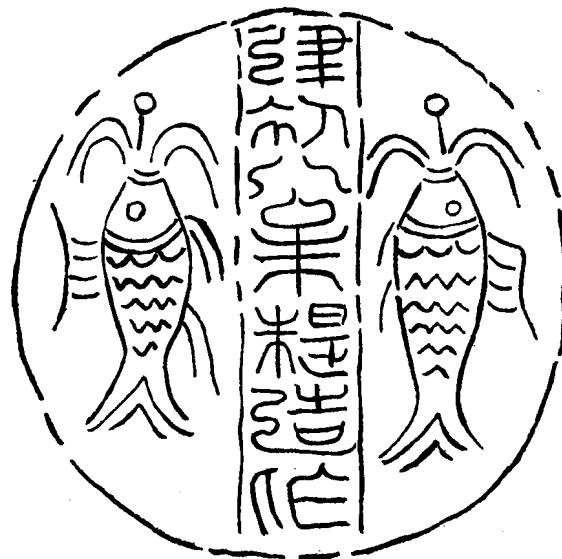
第三輯



2022/29

昭通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赠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云南省昭通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室编

一九八八年三月

目 录

昭通东晋墓壁画记	谢允鉴	(1)
昭通地区豆沙关唐袁滋题记摩崖石刻简释	袁斯信	(24)
考古小记	张希鲁	(35)
李、蓝义军在自贡的活动概况	黄德明	(38)
我中学时代的母校云南省立第二中学校	姜亮夫	(54)
题姜亮夫兄《昭通方言疏证》	浦汉英	(68)
刘平楷烈士传略	转 载	(69)
忆卓兰芳同志	浦汉英	(76)
蒋永尊烈士事略	史 鉴	(81)
怀念永尊同志	郑燕铭	(88)
永焜支队的由来	高 原	(91)
深切怀念我的老师马冰清	刘启宇	(95)
张开儒传	史 鉴	(103)
张福翁传	戴仁甫	(106)
怀念前辈老友陈一德先生	浦汉英	(108)
我认识的张希鲁老师	陈本明	(110)
解放前在昭通从事新闻工作的回忆	黄济舟	(120)
杨德亮在西北	李敬宝 苏复涛	(143)
我参加抗日战争的片断回忆	卢兴国	(170)
解放前昭通的“土汇款”	陈云涛	(174)

- 昭通国民教育之往昔 虎永刚 (178)
解放前昭通东区国民教育的发展简况 马光甫 (182)
抗战时期昭通高松两级小学概述 马宣泰 (189)
《恩安添建蓄水闸坝碑记》初识 曹吟葵 (196)
清初金沙江水道开浚概况 陈序德 (200)
禅宗法师释诚学 林 空 (206)
李燮阳留东日记摘抄 编辑室 (211)
昭通市政协第二届委员姓名录 编辑室 (221)
补白诗词二十五首
晋墓壁画等图片四页

昭通东晋墓壁画记

谢允鉴

壁画，在历史上是最早的一种绘画形式，古今中外，流行甚广。它是描绘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小器材壁面上的，有：石窟、岩壁、寺观、殿廷、宫室、墓壁……以及其它大小壁间等等许多种类的区别。仅就部份往古所遗留的而言，在国外的，如：朝鲜安岳《冬寿墓室壁画》；印度《阿旃陀石窟壁画》、《亚迦坦壁画》、《西基利亚壁画》；锡兰《坡罗奈路华壁画》；日本《法隆寺壁画》；《阿富汗壁画》；苏联中亚撒玛尔罕附近《边吉坎特城壁画》……等（注一）姑不详述。而我国甘肃省的《敦煌壁画》，就是举世闻名的一项美术遗迹；其它，如河北望都与辽宁营城子及辽阳《汉墓壁画》；吉林集安《高句丽壁画》；山东《梁山县汉墓壁画》；北京《法海寺壁画》；陕西、山西唐代壁画，新绛《稷益庙壁画》、芮城《永乐宫壁画》；河北《毘卢寺壁画》；甘肃嘉峪关《魏晋壁画》、天水《麦积山》与永靖《炳灵寺石窟壁画》；河南洛阳《西汉壁画》；荥阳《原武温穆王壁画》；安徽歙县《圣僧庵壁画》、绩溪与南京《太平天国壁画》；广西宁明《花山岩壁画》、《龙州花山壁画》；四川成都《大慈寺壁画》；广汉《龙居寺壁画》、新津《观音寺壁画》以及滇西《丽江壁画》、《剑川壁画》；滇西南《傣族壁画》；沧源《岩石壁画》……等，（注二）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些艺术遗产，内容广泛复杂，都各具特点。其中有的也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在各种斗争（如民族、宗教、生产与阶级斗争）中的现实生活面貌，极其珍贵。但是，地不爱宝，在一千五百多年前，东晋太原

年间改葬朱提（昭通古县名）的《霍使君墓室壁画》，于生产建设中，又发现在西南边远地区的云南昭通。这是继昭通先后出土的《汉孟孝琚碑》、建初金石、孟腾（腾）铜印和其它汉、晋古物之后，又新添了一种图文质朴，晋人手迹的石墓壁画，也是祖国勤劳先民所遗的一份文物，仍属“南中瑰宝，”不可忽视。恐时过境迁，为防备意外变化，因将此墓的发现经过及其壁画内容和初步认识，约略记之，以备查考。

【注解】一、朝鲜安岳《冬寿墓室壁画》，是一九四九年发现的，见一九五二年《文物参考资料》第一期。《朝鲜高句丽壁画》，见一九五八年《美术研究》第四期。“一千六百年前的壁画”见一九六六年《朝鲜》画报，第十一期页第18、19面彩色图。印度《阿旃陀石窟壁画》，见一九五五年《新观察》第十四期。印度亚迦坦，西基利亚、新台格拉、西克利亚等壁画，以及锡兰、《坡罗奈路华壁画》，见一九三〇年（即民国十九年一月十日《东方杂志》第二十七卷第一号四十二页所刊陈之佛作的“中国佛教艺术与印度艺术之关系”一文中。日本《法隆寺壁画》，见《国画ABC》，页13面。《边吉坎特城壁画》与前述《阿富汗壁画》的记载，见《美术研究》一九五八年第二期。

二、先后刊载于历年《文物》、《考古》杂志，以及《中国名胜辞典》等书中。

东晋墓画发现后的消息

一九七三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将昭通东晋墓壁画摹本放大照片，及豆沙关于唐袁滋题记摩崖拓片作为“中国通史”资料，长期陈列于晋、唐时期的场面中。

《昭通东晋墓画》栏，附有说明，摘录如下：

一九六三年三月，云南昭通后海子，中寨，发现的东晋太元11—19年间（公元386—394年）画像石墓的壁画。墓主

人姓霍，是三国时兴起的“南中大姓”之一。画上的侍从、家丁、部曲、武器等，反映了东晋贵族在西南地区的统治。……

又：《昭通晋墓壁画的临摹》一文，见云南博物馆编印的《云南文物·简报》一九七三年七月第二期，页14面“文博简讯。”

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我参加云南省政协第四届五次会议，写了提案建议政府正式在报纸上公布《东晋霍承嗣壁画墓》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三日，《云南日报》刊登了省人民政府公布：《东晋霍承嗣壁画墓》为：第二批云南省重点保护文物。

一九八三年四月九日，云南一百三十九件壁画巨幅临摹本（包括《昭通东晋墓画》在内）被选作《云南少数民族壁画展览》在北京正式展出，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首都美术界知名人士的高度评价。中央工艺美术院院长张仃说：“……临摹工作态度很认真严肃，有水平，《东晋墓画》很可贵。……”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已于四月九日，向三十七个国家广播了展览的新闻。……法国驻华使馆参赞说：“这样的展览，应当到外国展出。……有的画（如东晋墓画），需要用幻灯片打在上面，造成向四周放光芒的样子。……”意大利：利卡多马门·马利亚说：“……请你们到意大利几个城市去展出。……”（摘自六月十日省文化局整理稿。）

壁画石墓的发现

墓在昭通县城西北郊区（1963年《文物》12期的“《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误印为“东”北郊，《今日新闻》、《光明日报》等报刊，相继亦误为县城“东”北郊区，附此说明，应予更正。）十多华里后海子的中寨。是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即阴历癸卯年二月初十）因该村砖瓦厂工人，取用厂房对面大梁堆（即

古墓葬)封土时，才发现的。三月十一日上午，昭通师范学校第29班学生韩达斌到我宿舍(其时昭师校址在元宝山，我任该班图画课)，他向我说了后海子中寨发现墓画，参观者络绎不绝，但有些人用有油烟的灯观看，熏黑了部份字迹和画，有些地方被划破等情况。当时，我立即由昭师以电话告知昭通专署文卫科的同志，请从速保护。当天中午，我率次子崇冈与达斌及吴应宗诸生等，步行去看时，该墓石门下段有泥土遮掩，空间很窄，须匍匐而入，内面无光，以电筒照视之，发现石门内左上方有早年的盗洞，有两块倒塌下的长条石，被泥土盖着。而地面乱土中，遗有些破砖，完整的花砖已不见，别无它物。细看四周和顶部，遗有很多壁画和一些题字。壁上抿的石灰块，有些被熏黑，尤其是北壁八行墨迹题字处，横排上方看不清楚。有些地方被人抠破，如墓主画像面部，左眼珠不见了，石灰呈雪白痕迹较新。有些地方被手指抹搓了不明，如第三行‘刺史’等字，都是发现后，才遭到破坏的，实属可惜！十三日专署和地委宣传部负责人布署由县文化部门摄影和保护后，才减少一些意外的损坏。同时他们也清查得一些被人取去的完整花砖。十四日，上级托我拟稿转寄昆明《云南日报》始据稿摘要，刊登了此项消息。(其文见四月四日该报第三版。惟原稿‘寨’字，被误印为塞，‘用’字误印为由，霍弋之‘弋’字，误印为戈，附此说明)。我又于三月十四日和二十日，两次寄函到省政治学校学习的张君希鲁，告知发现晋墓情况，他在三月二十九日回信中说：“霍墓应早清理，……否则，如省耕塘汉石椁被破坏之覆辙，不可不鉴。……”(见《西楼文选》334页)因1957年省耕塘工地，发现过汉代石棺，有浮雕画，我与张君，曾建议负责部门，应迅速迁入城中保护。后来未得实现，竟被人打坏，殊为可惜(发现时，只看到石棺的一个侧面有画，其余三方仍在土中，未能得见。现幸存我当时临摹的一幅，刊在1963年《学术研究》第五期)，三月下

旬，省文化局，派胡、马两同志到昭通勘查、清理、钩摹、测绘和摄影（惜照片有些不明）。四月一日，他们把题字上的黑烟用肥皂水刷洗后，仍是模糊。五月十日他们第二次到昭通配合发电机，再次摄影，为了避免墓室内顶部石块的坍塌，五月下旬，县文化馆暂做木架由墓内支撑着，并用砖封砌了石门。

晋墓坐北向南，其形穹窿，墓顶如覆斗状，整体全用石块砌，高约2.6米，南北进深3.05米，东西宽2.8米，前面南方有石门两扇，可以开闭，门外左右，各有一个小龛。墓内顶端正中，镌有一个倒垂似瓜形的石质圆雕。顶与四壁的条石，糊抿白色薄石灰一层，用墨同彩色描绘很多“壁画”，内容丰富，并分别以红色、墨色写有隶、楷、行三体直行题字，约一百二十多个。北壁“八行题字”的字体，与国内历年曾经发现过晋人写经卷（见1963年《文物》第四期）由隶书过渡到楷书的笔意相类，极其珍贵。石壁四周都用如意纹图案分为上下两层，区别描绘。下层的内容，是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上层则多属于宗教神话之类，今分述之：

正面（北壁）：绘有墓主霍使君趺坐像，高约五十五公分，比四周其他人物画大得多（主体很突出，是东方绘画艺术传统画法中早期人物画作品表现形式之先例），其面部绘有疏朗的五绺短须，红袍黑帽；右手执蓝灰色毛扇（即麈尾扇），扇上绘有眼、鼻、口之状（正与金塔俊所记朝鲜发现东晋壁画上，冬寿像手执“画着鬼面”的毛扇相同）。坐像左手旁，用朱色画了一只“红缨旄节”插在座台侧；即“晋使持节”之信物例证（旄节和扇，与朝鲜·安岳发现的东晋穆帝时“冬寿画像”风格相似，惜金氏未记述三簇旄节一只，附此补之）。坐像右手侧遗有墨书简历“八行题字”，今按原行次，释文如下：

（第一行） 晋故使持节，都督江南、交、

（第二行） 宁二州诸军事，建宁、越巂、兴古三

- (第三行) 郡太守，南夷校尉，交、宁二州刺史，
(第四行) 成都县侯，霍使君之像。君讳
(第五行) 彪字承嗣，先是荆州、南郡讳，枝江
(第六行) 人。六十六岁薨，先葬蜀郡，以太元十
(第七行) □年，二月五日，改葬朱提，越渡
(第八行) □□，魂来归墓。

其文中，如“使”字写作“使”，“督”作“替”、“宁”作“寧”、“薨”作“薨”、“校”作“校”、“像”作“像”，“荆”作“荊”、“枝”作“枝”、“葬”作“葬”、“薨”作“薨”、“魂”作“魄”，及东西二壁题字的“虎”写作“虎”等，皆汉、魏、两晋、六朝时的一些变体字，与传世金石遗文，俱可互证。“八行题字”中，写有“太元十□年，二月五日，改葬朱提”之文。按：太元，是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年号，十字后面第七行顶上两个字已脱落，总在太元十一年到十九年以内的某一年（公元386至394年之间），为叙述修造此墓年代月日的重要证据。从我国西南边远地区文物的实物资料看，晋代有壁画的石墓，在云南是首次发现；而具有确切纪年和地志的东晋壁画墓室，在目前，在全国还是第一座。

画像左右方，绘有侍从共五人，又有一小女子，若捧茶献花跪进之状，头上左右似梳有两只小发辫的样子。最下一排，绘有尺度较小的人像十多个，仿佛练武和歌舞的情形，坐像左手旁，画一仪仗木架，插有曲柄华盖、旄幢、长条幡旗、团扇、戈、矛、直柄伞等兵器、仪仗之属。坐像顶端卷云带形花边上面，居中画有龟蛇，墨书隶书“玄武”二字，其西北角，绘有一人骑马射鹿；空隙间绘有单独花纹，以上到穹窿式的顶端，都画有云状图案，呈赤绎色。

西壁：图案画以下第一排绘汉族武士，存十三人，穿短衣、

长裤，涂红、黄、灰、蓝等色，鞋帽皆黑，手执环形柄长刀。第二。三排，用色、墨绘有披毡衫的人像，赤脚、斜头，亦有梳成尖长形伸出额前之发辫者，或即俗所谓“天菩萨”髻。两排存二十七人，同现今凉山彝族装束一样；我认为这一壁的人物画，由汉族与少数民族组合，是最突出可贵的。亦即《华阳国志·南中志》里所述“霍家部曲”……“夷汉部曲”等记载的一幅写实画片之插图例证，也是目前世上现存晋代壁画中所仅见的，它提供了研究云南古代民族史与汉彝关系方面，具有形象而生动的可贵资料（上排的毡衫，画有树枝及小圆圈花纹；下排是净面无花纹的，形象地说明了当时西南边远地区畜牧业、手工业的水平，还能制造出有花纹和染色的毡衫来。见于载籍者，如向达《蛮书校注》引宋人周云非《岭外代答》说：“西南蛮地产绵羊，固宜多毡毳，自蛮王而下至小蛮，无一不披毡者。……其上有核桃文，长大而轻者为妙。”近人徐嘉瑞著《大理古代文化史稿》提出：“披毡为牧羊人之遗俗，流入中原尚保存于甲骨文中，疑甲骨文之巫字从冂，‘即披毡形’；又说：‘羌族巫师，以‘树枝’象征最高之神，’其言均有参考价值。今此壁画毡衫上绘有‘树枝’及‘小圆圈’花纹，是值得研究的）。其它如墓室穹窿式之结构牢实，花砖之坚质以及壁画上之颜色很分明，还能保存一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可以看出当时的石料建筑工艺水平不低，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对社会生产，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图录。再下一排，绘有几个披盔甲骑马的，牵着缰绳向前行进之状。由内向外的右手边，在斜行云状纹样二方连续画以上，绘有一龙形，墨写“右青龙”三字，侧有踞坐昂首式的虎一个，两只三角形的耳，画在额上左右方翘起，甚雄壮；又画有二鹿，形较小，稍剥蚀，旁用朱色写有“虎□鹿”字样。（有人将虎形，认为是‘人面虎身兽则与侧面的题字，不相合了。）西北角画一建筑物，形如牌坊，横额上，有

‘龙楼’二字，屋脊上立一鸟，空间一飞鸟，又有一鸟如隼，在龙尾间。下有三足鸟，写‘广雀’二字；龙形前，画一女子站着，发上有装饰物，身穿红衣，左手若持草之状，旁有行书两行，一行墨写“玉女以草授龙；”一行有数字模糊，红写“玉女规臆而视”（按：汉、王子山作《鲁灵光殿赋》中，有‘玉女窥窗而下视’之句，殆引此义欤？）。旁绘一黄色梅花鹿，稍小，其侧画有花卉，以上到顶，仍然是云状图案。

东壁：斜行带状纹样以下，第一排绘执红色长条形幡旗的武士十四人，短装；有一猎犬，画骑铠马的，存五人，每人手执长戟之状。马身从头到后腿，系有铠甲之类遮护着。东南角，因受泥土浸湿，漫漶不明。二方连续图案画以上，绘一虎形，身窄长，与西壁的龙形，成对称式，它和汉画之尚未摆脱装饰意味者略同。上面写有“左帛虎”三字（“帛”字通“白”字，）按：乾隆时张燕昌、陆绍曾合著《飞白录》，解释飞白，即‘飞帛’，是互用的明证）。其上一鸟如雉，下一鸟如隼；东南角，画一小鸟似鹤，虎尾旁，有“宣兵□”字，其侧一楼阁，旁绘一小鹿，写有“番鹿”二字，鹿旁画一石阙，题一‘厥’字。其上仍为云状纹。

南壁：即两扇石门横额内，居中画一房顶，有瓦片之状；其西南侧，画一守卫武士，头戴盔（即兜鍪，）身穿铠甲，（即筒袖铠，）手执兵器，旁写“中门侯”三字。向西角，还有朱色钩画稍大的“火”“米”两个像字形的纹样，（会泽夏君光南赐札，以为是天师教符号，与道教近。）下面画有较小的虎形、马形，已残缺。东南角，剥泐不明。二方连续画上面，左顶端画一红色鸟，似相传的凤形，写有带隶体“朱雀”二字。右侧画一个马形很小，左右有圆形的单独图案。其余三方镶石完好。

1964年8月，昆明师院关心文物的王云、吴积才等同志来昭通，经有关部门同意，拆开原墓室封砌的砖，约我再去观

看，见到有水份的木柱上，生出很多霉衣，四周壁画，有些地方，又遭受新的损坏。1965年2月，向省人代会，再度写了提案，建议请速抢救保护，1965年6月23日，北京有关部门，派祁英涛、李全庆等同志到昭通查看晋墓，27日，我抽空又去看，顶部石裂增宽，潮霉尤甚，色、墨愈淡。7月3日，祁君等选取壁画次要部份，进行化学药液凝固的试验工作，完毕后回北京。同年7月，省文化局派人到南京等地学习有关保护壁画的技术。迭经多次研究，于10月中旬，省文物工作队，到昭通进行迁移在县城孔庙内工作。1965年11月初，由昭通专区建筑工程公司承担晋墓迁建工程，开始顺次编号拆石，11月6日，天气晴朗，我应邀去看，遇见省博物馆董馆长亲临指导，其时光线充足，壁画上墓主手执蓝灰色毛扇上，绘有眼、鼻、口之形，亦可分辨，特为记之，下午四时返校，11月14日上午，我偕张君希鲁（已返梓里）并带崇山、崇崑等多人去看，工人挖到方形墓室正中泥土下，又发现一条有花砖镶砌的排水沟，殆为防备潮湿而设者。因结合墓文写有“改葬朱提……魂来归墓”之语，以及出土时，曾在封土石墓原地内外和前后方挖寻、清理，均未发现尸棺与其它有字画的刻石而剖析之，更足以证明此墓不是有尸棺的葬式，而确为画像于石壁，招魂享祀之墓葬，亦即霍使君后裔，于距他死后四十多年，在东晋太元年间，才为他修建之“霍使君画像招魂石墓”无疑。盖昔人早有此风，如宋代洪景伯所撰《隶续》，已载有“汉灵帝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张景为其先人刊像于石壁，”即其例证；故“八行题字”简册中，很郑重而清楚的只写“霍使君之像”的明文词句也。是日中午，由原路进城时，又趁机会与张君等顺路赶到东南角正对霍墓咫尺间同村的陈家营去看1931年发现过，有隶楷过渡书体的《风神字迹刻石》原出土处的堆积，已犁为有农作物的耕地了。《风神刻石》昔年已定其字体在两爨碑之间，今从霍墓位置与其为比邻而旁证

之，指为晋物，凉亦相近。又拆石工人向我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午“日环蚀”的那天，拆到“八行题字”石块，因接缝处石质脆薄，墓文横排上方，约十三个字迹，被上边重石压碎，无法保住，而最关键的名讳“彪”形之字，亦已破碎了，实太可惜！

(文革初期，某电影单位，自动拆开封门砖土，装进物品，又被破坏些字、画原迹，更令人痛心。)二十八日，我向工作队同志借看两周前，滤色所拍的墓文照片，其名讳字迹，形如“虩”，左偏旁下方“巾”字形仍明，与1963年那次的照片，都是唯一的重要证物，(我另有《后记》一文，已提到《清理简报》的“铭记摹本”与真迹有差距。最好是请将于五月十日清理时，重新拍摄寄省保存的那张“八行题字”较清晰的原照底片，设法精工放大，制成珂罗版，附带印出流通，以存真相，以餍众望。)尚冀收藏者，慎重保存，精印流通。同时，我又借看了此次的覆钩本，其名讳字迹，又多钩出几笔，其形如“虩”。接近彪字，则与前年在《文物“杂志发表，形如“找”的写法，根本不同。借三次覆钩，都不一致。《爨龙颜碑》中，班彪的彪，写作‘虩’亦变体字，这次马君覆钩本已经接近彪形，只因原墓题字墨迹，经刷洗后，有些地方现得明，有些现不明，甚至竟以石灰墙上凹裂处乌黑残痕，也误认为是笔画，反而不易辨认。

对霍墓研讨者，有王、车两君，今将其赐札，附录于后：

昆明师院王云同志赐札(一)

饮涧先生：……关于昭通霍墓的发现，至少有这些意义：一，对云南地方史，提供了实物资料；二，壁画“天菩萨”髻、“披毡”等，对民族服饰等，有参考价值；三，郭沫若论《兰亭序》真伪后，对书法，字体演变，有参考价值。……我院方龄贵同志，向省博物馆借了几张霍墓墓文底片，在显微阅读机下辨认，有争论的字：第一，最关键的就是‘讳’字后的一个，(他们发表为“找”形；第二，“荆州”上的两个字，他们发表为“卒是”；近

来我们反复分析，觉得有问题。第三，“枝江”后一个，发表为“牧”，我们觉得还值得斟酌。……

王云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赐札（二）

现把方龄贵先生从晋墓八行题字底片，在显影机下所描的字，寄上一张供参考。可注意者，五行第一字摹作“虩”。彪字轮廓较清楚，实属幸事。惟宝盖下那一撇，我看某张底片上则不见。……

王云十二月十四日

赐札（三）

上月……约同车铭同志等……并建议找出原底片，再度观察。……而释群疑。本月初，省博物馆找到两张底片，我会同胡振东、郑名垂同志到师院图书馆，借显微阅读机放大观看，从一张底片上，（据说是一九六五年迁墓前所摄那张。）五行第一字作“虩”，从而肯定此墓是霍彪画像墓，了结这一公案……

王云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云南省博物馆馆长车铭同志赐札：

饮涧老师：迭次来书及文稿均已奉悉，孜孜于爱护国家文物的精神，跃然纸上，令人感佩。上次我馆郑明垂等同志到昭通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摹绘东晋壁画墓，承谢老师不吝指教，对我馆原在《文物》发表的壁画摹本及墓文等，均有所补阙纠误，使文物真貌得以保存；谨此致谢，校正之处，已详函历史博物馆说明，应以此次摹本为准。四月间，并由原调查及撰稿人胡振东同志到师院借用显微阅读机细看墓文，“虩”形字迹，尚约略可辨。这一关键性问题弄清后，文物与文献挂上了钩，两者相互补证，历史情况便豁然开朗了。……

车铭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又，另有会泽夏光南（嗣尧）先生赐札，摘录如下：

饮涧吾兄大鉴：尊撰《晋霍使君墓室壁画记》，在发现经历

史上极重要，如无此项对证参考，海内学人将无从知其实情。……尊记提出请将于五月十日清理时，重新拍摄寄省保存的那张“八行题字”较清晰的底片，设法精工放大制成珂罗版印出流通，以存真相一事，余极端支持，务必贯彻此点。……你所提出“魂兮归来”之楚俗，在‘民俗学’上，当是个大的发现。……

夏光南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另一函云：“霍墓南壁向西角，‘火’、‘光’形纹样，鄙意或仍是天师教符号，与今之道教近，因李雄崇拜天师教，晋代流传南中，唐贞元时，袁滋等入滇，与南诏盟于点苍山，向达先生所谓南诏只求证三官，不求证佛陀，……乃晋代传来之天师教也。”

夏光南 十二月一日

根据王、车两位赐札，墓文第五行第一个字，用显微阅读机细看，已接近古彪字，又在拆石之际，工作队同志，送我两张滤色照片，五行第一个字迹，左下角尚有“巾”字的遗痕，我寄一张与杭州大学姜君亮夫参考（多数人认为是‘彫’，古彪字的残痕），姜君回我的信说：“彫”字显然，主案已定，余皆枝节问题矣。这张珍贵的照相底片，更望收藏部门，加意保存之。

又1963年《文物》十二期发表的“摹本”首行第一个“晋”字，其上截居中，也多一竖笔，与真迹不合。又第五行第五个字，摹作‘卒’字，则与第六行的‘薨’（古称诸侯死曰薨，符合了霍使君的官阶身份）字，互有矛盾，难于理解。第六行第一个字，摹为‘牧’，仍有差距。联系上面‘枝江’是个小县而臆为‘牧’，史无其例。盖只有以州称牧的（《礼记·曲礼篇》说：“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如汉末刘焉、刘备，均领益州牧，刘表为荆州牧，西晋司马越，自领兖州牧，王敦领扬州牧，其他如：后赵、张骏为凉州牧，前秦王猛为冀州牧之类。且墓文中已记有交、宁二州刺史，成都县侯，因意及霍

使君的后裔，不可能抛弃较大的官衔，而采取较小的县邑来称史无例证之牧，垂示后昆，这也是费解的。

石墓的复员和修建保护室

1965年11月，他们决定将晋墓迁移，复原安置在县城旧孔庙内‘汉碑亭’对面泮池侧东北角隙地，遂于11月23日，熊、胡两同志与专建公司石工师傅龙焕清等审定了已测过安放墓室的石灰基线，26日，即开始挖土，28日，填好碎石、毛石后，按照原来坐北朝南的方向所编原石号码，将壁画石块，依次安砌，固以水泥，12月8日，在石墓四周，用钢筋和碎石混泥土加固，已砌到有花边上面的部位，17日严寒，降雪结冰，工作仍不稍懈，最后，盖砌顶上方形石块，复原工程，遂按期完成。按照‘决定’，采取圆形蓝图式样，用砖、石镶砌‘保护室’。25日，继续划定灰线。次年1月5日，又着手挖土、砌基石，门坎石在8日安毕后，填室外走道基底碎石，1月28日圆形石脚，安砌完工。但在这段时期，公司另有修建北顺城的服务大楼、书店大厦等其它紧急的巨大工程，故“东晋壁画保护室，”虽推迟甚久，幸告落成。1981年，依‘汉碑亭’例，于砖砌之‘保护室’前面，嵌入磨制水泥石板一方，用直行隶书，写八个大字，标题其名曰：“东晋霍氏壁画墓室。”旁书小字两行：首行书“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末行书“公元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建”。（外镌印章三方：首行下，印章一，文曰：“癸卯仲春出土。”末下行，印章二：一为“辛酉六月捡修刻字；”二为“昭通谢饮涧书，”均篆文。

1987年夏，《昭通·画册》一书，在香港海洋制作印刷公司，用彩色精印成帙问世，令人欣喜！其画册中，第3、4页，即印有‘晋墓保护室’照片和壁画摹本，可资参证。（按：其西壁有“夷汉部曲”之壁画，应该排印在“八行题字”后的侧方。其所附说明中，越嶲郡之“嶲”字被误印为‘隽’，亦应订正之。）